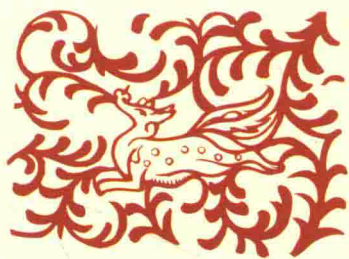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三人谈·漫说文化

钱理群
黄子平 著
陈平原



(增订本)

博雅撷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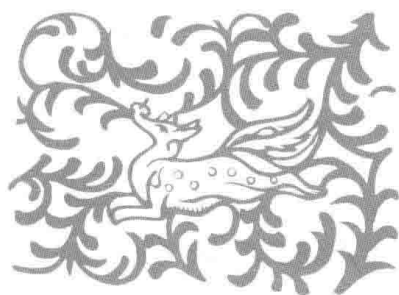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三人谈·漫说文化

钱理群
黄子平
陈平原
著



(增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著. —2版(增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0
(博雅撷英)

ISBN 978-7-301-30826-4

I. ①二… II. ①钱…②黄…③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5719号

- | | |
|-------|--|
| 书 名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SANREN TAN ·
MANSHUO WENHUA (ZENGding BEN) |
| 著作责任者 | 钱理群 黄子平 陈平原 著 |
| 责任编辑 | 艾 英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30826-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010-62752015 发行部010-62750672
编辑部010-62756467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0毫米×1230毫米 A5 9.875印张 216千字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69.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博雅擷英

小 引

陈平原

这里合刊的,是两册有趣的小书。

说“小书”,很容易理解。相对于时贤动辄四五十万字的大著,这不大的篇幅,实在有点“寒碜”。不敢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以一当十,言简意赅。小书就是小书,不必讳言。只不过西哲有云:“大狗叫,小狗也得叫。”我想补充一句:叫得欢的小狗,其憨态也自有可观及可爱处。如此不太恰当的比喻,用在我们当初的“表演”,还是挺贴切的。

这就说到“有趣”了。面对这两册小书,最可能感叹“有趣”的,很可能不是热心的读者,而是作者本人。从1985到1990年,我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在区区燕园里,“热火朝天”地切磋学问,先是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又“漫说文化”。而这两次合作(加上“未完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多少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不好说;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很是感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十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

到了为出版《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而

分头撰写《岁月无情又多情》《漫说“漫说……”》和《十年一觉》时,已颇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意味。其实,不过几年光景,可物换星移,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豪气、志气与稚气。

将“志气”与“稚气”相提并论,并非玩弄文字游戏。正因为所知有限,方才果敢决绝,认准了,就一直往前走。若等到饱读诗书、阅尽沧桑,那时很可能反而四顾茫然。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我们,年纪虽不小,但依然“童言无忌”,也自有可爱处。

翻阅此类“开风气”的小书,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之演进。近些年,不断有学界新秀反省我们当初的“反省”,引申、证实或质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顺带的,也就对这一概念产生的契机、背景、动力以及效应等感兴趣。于是,常有人通过各种途径打探这册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也不时有出版社的朋友建议重印此书,但都被我们婉言谢绝。理由很简单:未能更上一层楼,贸然重做冯妇,愧对江东父老。

直到有一天,读到某君大作,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表作为“历史事件”来考察,这才猛然醒悟——那文、那书,早已进入历史,既没必要修订,也不可能完善。念及此,有点悲伤,可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

想想也是,不就因历史的偶然,侥幸留下几行蹒跚学步的足迹?既然随时都可能被重新卷起的海浪冲刷得一千二净,又有什么可矜持的?就这个样子,不做进一步阐释,也不纠正当初的失误,让其素面朝天,更能显示此书的“历史价值”。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当初因某种特殊原因而被撤下的《关于“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蓦然回首,最令人感怀的,其实不是什么是非与功过,而是促成那几回“三人行”的思想潮流、社会氛围,以及自以为颇具创意的对话文体。

2003 年 4 月 2 日于京北西三旗

目 录

小 引	陈平原 /1
-----------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写在前面	3
------------	---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2
-------------------	----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	36
-----------------------	----

缘起	36
----------	----

世界眼光	46
------------	----

民族意识	56
------------	----

文化角度	67
------------	----

艺术思维	84
------------	----

方法	95
----------	----

附录一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109
-----------------------------	-----

附录二 关于“表现即艺术”的讨论	139
------------------------	-----

附录三 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种种反响的综述	143
-------------------------------	-----

后 记	159
-----------	-----

漫说文化

漫说“漫说文化”(代序)	陈平原/163
岁月无情又多情	钱理群/167
十年一觉	陈平原/170
漫说“漫说……”	黄子平/175
“说东道西”的姿态	钱理群/179
漫卷诗书喜欲狂	陈平原/183
“父父子子”里的文化	钱理群/191
兼问苍生与鬼神	陈平原/198
“乡风市声”的意味	钱理群/209
未知死 焉知生	陈平原/219
“世故人情”中的智慧	钱理群/232
男男女女的主题	黄子平/237
难得浮生半日闲	陈平原/245
何必青灯古佛旁	陈平原/254
三人谈——落花时节读华章	263
增订本后记	309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2004年1月 潮州行，三人品茗聊天，
逸兴遄飞。



写在前面

·

—

当我们三个人就各自研究课题中碰到的一些疑点在一起“神聊”的时候,并未意识到会有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萌生出来。这个概念的某些轮廓一旦从思想迷雾中浮现出来,我们都不禁为之兴奋不已。好些久思不解的问题,似乎突然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中获得了解释——仿佛一道闪电把某些事实、事实之间的联系、评价事实的方式等等都照亮了。同时我们也体验到了:对话,作为一种人际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一种使思想增殖的方式。

思想从来都不是一种自言自语——智慧的火花只有在撞击中才会迸放出来。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新鲜的见解、大胆的设想以至神妙的隽语,是在对话中产生的。书信往来,文章商榷,都不若直接的对话来得带劲儿。在直接的对话中,你领略到思考的乐趣、口语的魅力和一种“现场气氛”。对话者常常会因冷不丁蹦出的几句隽语或“打通”了某个难题的关节而激动起来。这里没有任何防御的堡垒,对话者乐于“赤膊上阵”,紧张地开

动脑筋,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提问,捕捉种种转瞬即逝的思绪。学术性或半学术性的对话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柳暗花明”时固然欣喜欲狂,“山重水复”处更有魅力。论证、说明、释疑、反驳,在对话中悄悄地拓展自己的理论设想。是围绕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一次智力游戏和精神散步。

当然,既不同于“侃大山”式的海阔天空,不着边际,也不同于学术报告会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围绕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议题,无拘无束地聊起来。有引经据典,直接从书架上取下书来翻开念上一大段的时候;也有节外生枝,近乎插科打诨的地方。对话中,不但要学会做一个“言者”,更要学会做一个“听者”。在中国,历来很重视“听的艺术”,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庄子说“勿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勿听之以心,听之以气”,而繁体字的“聖”字,正是从耳从口。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听的艺术”似乎被我们弃置不顾了——人人都抓住你滔滔不绝地灌输,灌输是不需要这种认真、主动、积极的“听”的,那么人们也就学会了“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显然,光会说不会听的对话不是真正有水平的对话,在这里,“开放的心态”“精神互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古代文人据说曾经“清谈误国”,然而那种品评诗文、月旦人物的方式之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直截了当,寸铁杀人;有时举重若轻,画龙点睛。有风度、有情韵,仿佛千载之下,仍能想见当时的倜傥潇洒、挥斥方遒。唇枪舌剑也好,睿智幽默也好,对话必须成为一门“艺术”。聊天容易,真正聊得有“神”,就很难。我们常常觉得在“神聊”中,“神”比“聊”本身还要重要。尽管聊的是学术,也仍然可能“神采飞扬”。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

把学术聊天的内容录下来,整理成文字发表,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也可能隐伏着某种“危险”。即使不考虑面对着录音机话筒时的聊天毕竟跟平时的聊天有所不同,也还有一些原先未曾料到的因素值得考虑。

彼此过于熟悉的对话者,在共同话题的多次讨论中,可能形成某些旁人无法理解的“惯用语”或“行话”,常常某些要紧处只需寥寥数语就能互相心领神会,照录之后却可能令读者觉得前言不搭后语,不知所云。许多彼此都熟知的背景材料在对话中往往一笔带过,对读者来说却必须交代清楚。那些离开了具体语境、失却了音调变化及与表情、手势的协调的口语一旦变成文字,也常常显得过于“朴素”,索然无味。

古人清谈,谈上十天八天,就留下那么三句五句,当然显得“精粹”。如今倘以“学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对话,又要言之成理,言必有据,逻辑性强,又要求保持“神聊”的“神”,这就非常困难。整理时不得不使对话略为“紧凑”,不得不删去一些颇为得意的“题外话”,不得不在本来心领神会无须点破处啰唆几句——经过这么一番整容,发表出来的对话录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对话”了。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希望这类“拟对话”比一般文章更能表现人的思维过程,因而为读者们所接受。

理想的学术对话录应既有论文的深邃,又有散文的洒脱。

读者在了解对话者的思想时,又可领略对话的艺术。关键不在于整理成文这一后期制作的工夫,而在于对话本身是否“言之有物”。我们渴望见到更多的未加过分整理的“学术对话录”的问世,使一些述而不作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化,使一些“创造性的碎片”得以脱颖而出,并形成一种在对话中善于完善、修正、更新自己的理论构想的风气。

中国古代的“问难体”(《答客诘》之类),只是借攻击假设敌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设置障碍是为了显示论者跨越障碍时的高超,为了展现跨越之后那种快意的驰骋。现代也有一些名人谈话录或你问我答的名人专访,提问者往往以秘书、弟子的谦恭身份出现,不是真正平等的对话。我们现在各类学术讨论会频繁举行,即便讨论极为生动活跃,充满了风趣横生的插话、补充、反诘,整理出来的记录却又死气沉沉,仿佛是一篇学术论文分给了各位与会者每人念一段似的。

如今风行“纪实文学”“报告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之中,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口述实录评论”呢?

三

并不单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亲切、平易近人、随意、自然、放松。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读者看腻了架子端得十足的高头讲章或指着鼻子教训人的“大批判”之后,他们很希望参加进来与思考者一起平等地对话。这也是我们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学术论文付诸发表之后,想到要把我们讨论论文时的一些录音整理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甚至希望不是搞文学

史的普通读者,也能对这个概念涉及的一些问题发生兴趣。实际上,我们异常珍视那些来自专业之外的建议、批评和质疑。北京大学学生会博士生部曾经召开过一次小型的座谈会,讨论我们的这个概念。与会者从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我们意想不到的许多问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维材料”,扩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在别的一些场合,来自专业以外的意见总是使我们大受启发,获益匪浅。

显然,更重要的是,对话揭示了一种思考的“过程”,一种由不成熟通向成熟又通向新的不成熟的过程。我们从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提出来的仅仅是关于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特定课题的理论构想。把“现成结论”一端出来就想强加于人,就试图“罢黜百家,定于一尊”,我们多年来也受够了这类苦头了。钻研的过程、探讨的过程,可能比已经达到的结论更有价值。那些零星的、即兴的、一闪而过的想法,就算是不成型的碎砖吧,也许就能引出真正有价值的“玉”来。我们也知道,“胸有成竹”“烂熟于心”“一挥而就”,可能更显得自信、有气派、有分量、有爆发力。我们却更愿意把不成系统的被人轻蔑地视为“鸡零狗碎”的、很不成熟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暴露给人们。据说,高明的厨师谢绝人们参观油烟弥漫的厨房,高明的刺绣工也恪守“莫把金针度于人”的古训,高明的演员讨厌在演出时有人在后台探头探脑。我们却愿意提供“半成品”给有兴趣的朋友作进一步的加工——如果还值得加工的话。

我们深深意识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极为诱人而又纷繁复杂的文学总体,绝不是三个人所能承担的任务。需要有多种学科的协同作战,多角度、多参照系、多种方法的共同

探讨。那么,对话的方式是否可能引发一种积极地、活跃地、批判性地参与这一学术课题的研究态势呢?

实际上,细心的读者也已经看出,我们三个人在思考的侧重点、采用的方法、切入的角度乃至语言风格等方面的许多微妙的或明显的不同,甚至在一些主要观点上,也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各自的经历、气质、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等等因素的制约。通过对话,每一个人的“学术个性”就不可能被这“集体项目”造成的“高度统一”的假象所遮掩。这也正是我们发表“三人谈”的目的之一。倘若三个人都站在一个点上,那还只是一个点。三个点就可能组成一个等边或不等边的三角形。在我们的共同讨论中,正是那些分歧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如果不为表面的争执所迷惑,陷入无意义的“自我考证”,那么我们知道任何学术争鸣中真正具有深刻性的分歧都恰恰是理论的生长点。可惜的是,我们在众多的“集体项目”中看到的,常常不是个性的碰撞而迸放异彩,而是个性的相互消磨而使总体变得面目模糊。文学的研究可能跟自然科学不同,即使在航天飞机的外壳上刻下每一位参与研制者的姓名,这一科研成果也很难显现他们各自的个性。文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情感的投入,会在研究成果上打下个性的烙印。倘若文学研究的“集体项目”是由各个自由、活跃、充沛的学术个性组成的统一体,或许可能一变沉闷的“正步走”而成为生气勃勃的“艺术体操团体赛”吧!

有些爱好铁板一块式的“刚性体系”的朋友,可能会对这类极不严密的对话表示失望。确实,我们的构想绝不是“无懈可击”的、具有所谓“铁的逻辑力量”的体系。相反,对话暴露了或